

不負中央所託 譜寫香港新篇



議事
論事 葉建明

5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了新當選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高度評價李家超，「愛國愛港立場堅定，敢於擔當」，中央「充分肯定，也充分信任」；同時指出，新選舉制度「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中央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從沒有動搖，更不會改變。

習主席的重要講話不僅面向新當選的行政長官，也面向香港社會各界；是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要求，同樣也是對香港未來工作的指引，香港各界需要仔細領悟。

夯實良政善治的社會基礎

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是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次行政長官選舉，是鞏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一場重要選舉。此

次選舉李家超以超過99%的高票當選而順利完成。習主席高度肯定李家超，「愛國愛港立場堅定，敢於擔當，積極作為，在不同崗位上都履職盡責，為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作出了貢獻。中央對你充分肯定，也充分信任。」

中央對新一任行政長官的任命，體現了國家主權和中央依法對香港特區行使的全面管治權，同時這一實質性的任命，也是特區行政長官履行向中央負責的憲制責任起點。

全國人大去年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目的，就在於落實「一國兩制」中「愛國者治港」的基本原則，選出真心為香港，有責任有擔當有能力的人治理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三場選舉，都取得成功。這具體體現在選舉的「泛政治化」不再出現，反中亂港分子不能再進入政府架構搗亂奪權，破壞特區依法施政，社會也不再因為選舉而撕裂。而且，新選舉制度實實在在選出了令中央信任，特區市民認同的愛國治港者。

香港選出李家超作為新一任行政長官，是因為李家超的堅定立場、個人能力及往

績。李家超在政府有40多年的工作經歷。特別是回歸25年來，他經受住了各種考驗，積累了豐富經驗和能力，是意志堅定的、有能力的愛國者。當他決定參選時，一些最初有意參選者對他表示祝福，並明言不再報名參選。李家超的當選，正是體現了新選舉制度下的眾望所歸。正如習主席所說，實踐證明，新選舉制度對於落實「愛國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國家主權、推動形成社會各階層各界別齊心協力建設香港的良好局面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套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實際、符合香港發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

習主席對新一屆特區政府同樣充滿期待。他強調，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已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相信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一定會展現新氣象，香港發展一定會譜寫新篇章。

習主席的講話體現了中央對特區一如既往的支持，也給了香港社會信心和鼓勵。

在香港國安法與「愛國者治港」新選舉制度下，香港發展的局面發生巨大變化。懸浮在香港上空的政治黑雲不再；立法會不再是「逢政府必反」，而是有監督，有建言，有協同配合；社會上，不再是以「政治掛帥為綱」，關注經濟民生，成為市民最大的關切。求發展的民聲呼聲，呼應「愛國者治港」的強大力量和聲勢，將是未來特區走向良政善治的最大社會基礎。

齊心協力才能開創更好未來

未來五年，是新選舉制度得到落實並將獲得實踐檢驗的五年，是香港由治及興，重拾競爭力的關鍵五年。李家超在會見中表示，「我衷心感謝中央對我的信任，任命我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這是我畢生的榮幸。我定當克盡己任、肩負使命、全力以赴，不負中央的信任、不負香港市民的期望。」不負中央所託譜寫香港新篇，既是李家超的決心，也可以說反映了香港廣大市民的心願。

接下來，新的政府班子將組成。新班

子對於未來政府實現良政善治具有關鍵性意義，希望新任行政長官把關，也希望社會各界無私推薦，令真正有承擔、有能力，符合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的愛國治港者「五有」、「五個善於」標準的優秀治理人進入政府治理班子。

與此同時，香港的發展進步，需要廣大市民的參與支持。「一國兩制」是香港社會最大的「公約數」，是社會公認的香港繁榮穩定的制度保障、「壓艙石」。習近平主席強調，25年來，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中央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從沒有動搖，更不會改變。這是給香港的定心丸，也必然成為香港市民與特區政府同心協力爭取更好明天的信心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英HPI計劃與「BNO騙局」

讀者來稿

章名

英國近日推出了一項新的工作簽證，名為「高潛力人才」（High-potential Individual）計劃

（以下簡稱HPI），容許5年內在全球50大大學畢業的人士申請工作簽證，目的再明顯不過，就是為了爭奪全球的頂尖專才。其實專才對於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但唯獨英國在這個時候出台一個高姿態針對高端人才的計劃，卻為整件事塗上了一層黑色幽默色彩。

英國政府操弄所謂BNO護照新政策，眾所周知真正原因是脫歐後國內經濟失去動力，瞄準的目標其實是香港的高素質人才。至於無錢無技術的「手足」，大部分放着不管便會被「自然淘汰」。

BNO難吸引高層次人才

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政府突然又推出HPI，那就不得不得讓人懷疑，是不是所謂「BNO計劃」的成效不如理想？先看一看HPI的具體要求，首先是學歷，申請人必須於過去5年在全世界50大大學畢業，單論香港的話，符合資格的只有過去5年的港大、中大和科大畢業生。至於申請費用則為715英鎊（折合約7100港元），還要另外支付英國國民保健署的醫療附加費。另外HPI亦規定申請人帶同家人須至少1270英鎊（約12000港元）的資產證明，並要求申請者的英語水平達到ELTS B1成績。

光看上述這些條件，已很明顯感受到HPI的資格審查比「BNO計劃」高出不少。而且申請人從一開始就可以攜帶家屬，也不需僱主擔保。據英媒報道，HPI不設人數上限，實際批出數額取決於需求。擁有HPI簽證的人，不只可以從事大多數工作、自僱創業，還可以與伴侶子女在英國生活等等。跟「BNO計劃」比起來，實在是「一個天一個地」。但有關HPI最精彩的還有一個申請要求：「申請人必須通過安全和犯罪審查」。這下英國可謂完全露了底！

記得英國政府起初推出「BNO計劃」時，宣稱是為了幫助所謂「受迫害的港人」云云。然而，

所謂「受迫害的港人」，也就是修例風波期間警方依法拘捕的暴徒，以及在背後煽動的一班幕後黑手。從當時的語境來判斷，英國理應不介意這些人涉及的罪行，但來到今時今日，英國竟然在重要移民政策上要求申請通過安全和犯罪審查，這不是自打嘴巴嗎？

英國內政大臣彭黛玲（Priti Patel）在HPI出台後，形容「很自豪推出這一條令人興奮的新路線，作為我們基於積分的移民系統的一部分，該系統將能力和人才放在首位，而不是某人來自哪裏。」這段說話跟之前「BNO計劃」時的方針可謂截然不同。

事實上，「BNO計劃」早已徹底破產。英國政客嘴上說歡迎「手足」，但其心底裏，同為「手足」也有貴賤之分，如果閣下本身是有高學歷的專業人士，曾在香港打打砸砸不過是小問題而已；但如果低學歷低技術，口頭上雖然仍會表示歡迎，但來英後如何生活，就閣下自理了。

「低學歷」不受英國歡迎

英國原本的想法是，通過不斷抹黑和攻擊特區政府，在香港的高端人才中產生離心力，再配合各種計劃來搶奪本港人才。但這個如意算盤未免打得響過頭，「BNO計劃」只吸納了極少數英國想要的專才，相反一大批只有低學歷低技術，甚至不懂英語的「手足」卻熱衷赴英。這時候英國才發現自己話說得太響，做了「賠本生意」，專才要不成，反而吸引了一批人與當地基層居民「搶飯碗」。

英國政府當然不可能來到現在才突然說重新收緊「BNO計劃」，如是者，HPI就變成一個折衷的產物。但到了這時，英國政府的想法早被看透，至少對香港人而言，英國政府的誠信已經所剩無幾。究竟移民後的實際生活如何，媒體已有不少報道，有人在香港時擁高薪厚職，結果赴英後只能由基層重新做起，每月的水電煤已足夠頭痛，遑論讓家人過上好生活。更有不少人選擇回流。

究竟這個計劃會如何收場，暫難定論。但不論是「BNO計劃」、HPI，還是日後可能出現的其他名目，英國當局虛偽的一面已表露無遺。

文化「數字化」該從何入手？

政策思考

蘇曉明、林珮彤

文化產業的數碼轉型進行得如火如荼，已順應數字經濟發展，成為國家文化政策的重中之重。近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下稱《意見》），以建成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為目標，立下了八項重點任務，這份最新的文件奠定了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未來發展基礎，將離不開「數字化」。

「數字化」是內地文化政策的重點。自2017年以來，內地便積極發展數字文化，以此提升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及加強文化的普及。例如於2017年公布的《文化部關於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以及2020年公布的《文化和旅遊部關於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又或者因應「十四五」規劃，於2021年陸續發表的《「十四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以及《「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等，皆能見到文化科技應用的蹤影。可見推動「數字化」的過程循序漸進，多份政策文件在此主題上一直互相呼應。特區政府在2020年首推「藝術科技」政策，更於今年年頭宣布加大這方面的撥款資助。內地雄心勃勃地實施文化「數字化」，對香港有何參考價值？

第一、鼓勵並扶持新興文化內容及企業：「元宇宙」內容逐漸流行，許多本地文化及金融企業正在開拓這個藍海市場，衍生出不少與互聯網相關的新型業態，例如NFT、數碼藝術等，滲透數碼娛樂、影視和其他行業，帶來各種商業機遇和新工種。初步分析指，「元宇宙」的全球市場規模將超過大約6萬億港元，潛力不容小覷。同時，這也可以為傳統文化藝術增添新的跨界別合作機會、內容創作及傳承的方式。

例如，《意見》中的第五項任務是「發展數字化文化消費新場景」，研發「全息呈現、數字孿生、高逼真、跨時空等新型體驗技術」，促進線上線下融合的數字文化消費模式，正正是配合這個趨勢。

因此，政府針對創意產業的政策應該更前衛、更大膽，以及更有策略性地對與藝術科技業務有關的中

小企及初創企業提供指引和支援。

第二、運用科技賦能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如何能成為文創產業的後盾，業界正積極探索中。僅以大數據為例，便已經有不少應用之處。數據經過抽取、整合及交易，進行有意義的分析和交換，便可成為文創產業的重要資產。除了從文化場所得到的觀眾資訊（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已有做），大量平台用戶或消費者的資訊亦能作輔助決策的重要元素。

《意見》中的第四項任務是「促進文化機構數字化轉型升級」，指出要「推動文化機構將文化資源資料採集、加工、挖掘」，並將相關資料「轉化為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資產，達至數據共用，幫助產業化」，鼓勵文化企業與團體對收集得來的數據與資料加以運用，將其變成幫助生產及提升文化內容與體驗的關鍵資源。

當然，在文創產業善用科技之餘，亦要小心不要讓其凌駕藝術創作的初衷。

第三、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數碼系統：除了上述一些比較新穎的文化內容發展，我們也不可忘記公共文化設施，例如圖書館、博物館和藝術館，畢竟他們才是能夠將藝術與文化普及的重要場所，亦更貼近普羅大眾的生活。

《意見》中的第六項任務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水平」，推動「全國智慧圖書體系和公共文化雲建設」，希望為文化設施進行升級轉型，例如優化面向市民的公共文化服務平台，讓服務普惠應用。另一方面便是將文化資源數字化，讓市民共享文化內容，讓文化內容得以妥善管理和廣泛傳播。

其實《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中的策略之一便是「開發智慧圖書館系統」，此智慧圖書館系統預期在2024年3月推出核心圖書館功能，並計劃在2025年9月能夠全面應用。公共文化服務對社會民生非常重要，康文署轄下的博物館到圖書館，皆有很大空間配合數碼時代，進行優化。

實施文化「數字化」，當中可以做的遠遠不止三項，希望新一屆政府和擬成立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在制訂文化政策時，能夠推陳出新，助文化及創意領域進行有意義的「數碼轉型」。

作者分別為團結香港基金藝術及文化研究主任、助理研究員

真正的威脅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自己



國際觀察
宋魯琳

雖然世界早就對美國頻發的槍擊悲劇麻木，但19名兒童的慘死還是震驚了全球。歐洲媒體這一次也出離憤怒了。法國《世界報》犀利的評論道：「如果說，美國還有什麼特殊性的話，這就是，美國容忍自己的學校經常變成血跡斑斑的射擊場。」這和《紐約時報》的觀點可謂完全一致：「美國變得無法治理不是因為政治分歧或抗議或不文明，而是因為這個國家不願保護和關心它的公民——它的婦女、它的少數族裔，尤其是它的兒童。」

槍殺早已成為美國未成年人口頭死亡原因。《華盛頓郵報》數據顯示，過去20年，331所學校有超過31萬1000名學童遭槍擊受傷或死亡。

民意表達機制只是擺設

槍擊悲劇一再發生，表面上是持槍自由：一個三億多人的國家竟然有四億支槍在社會流通，但真正的原因一是制度，二是文化。

制度上看，主導美國決策的因素有二：一是選民，二是利益集團。選民有選票，利益集團有資本。候選人要想贏得選舉，這兩者不可或缺。

顯然四億多支槍背後的選民是極其龐大的。沒有哪個政治人物會愚蠢到去挑戰他們的利益。政治人物頂多會像奧巴馬做秀般講講：自由社會絕不允許此類事件發生。利益集團則是武器製造商和擁有500多萬成員的「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當年戈爾角逐總統不敵小布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倡議收緊槍械管制。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影響在美國不是秘密。既非經濟中心又非文化中心的華盛頓能如此繁榮，就要歸功於長駐此地的兩萬多家利益集團機構。於是美國人自認擁有「金錢買來的最好的國會」，而且「金錢購買了溝通的途徑」。

2012年12月桑迪胡可小學發生造成20名幼童死亡的槍擊慘劇後，連任成功的奧巴馬決定放手一搏，投入巨大政治資源力推控槍法案。在參議院投票前兩周，奧巴馬不僅親自帶領數名校園槍擊案遇難兒童家長來華盛頓，參與對國會議員的游說工作，而且他還做了重大妥協：取消了禁止攻擊性槍支與大容量彈夾銷售的內容。但最終禁槍法案還是胎死腹中。據英國《衛

報》報道，投反對票的參議員中，只有三個人沒有接受「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的資助。當然同樣重要的原因是，雖然奧巴馬沒有選舉壓力，但國會選舉又快到了，議員還是要考慮連任的。

美國一向自認是民主表率，擁有充分和多樣的民意表達機制，能夠有效保護弱勢群體。但禁槍難於上青天就已經證明事實卻並非如此。因為資本的力量遠遠大於民眾，它有太多手段去左右政治。不僅禁槍如此。本世紀初著名的安然破產醜聞，之所以能紙裏包住火玩到最後，就是因為當時參眾兩院的能源委員會大部分委員都接受安然的資助，聯邦能源委員會的主席更是在安然的推薦下才獲得任命。這樣的制度安排，民意表達機制也就只能是擺設。

從文化角度講，美國是一個移民組成的國家。移民之初，在一個陌生的大陸，既無政府，也無法律，是一個原始叢林法則大行其道之地。於是為了生存，不得不人人持有槍支。等到美國獨立之時，連正規軍都沒有的美國人民，就是憑藉民間武裝，取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到後來奠定美國今日版圖的西部大開拓，槍支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由於這一歷史傳統和歷史貢獻，持槍自由便成了神聖不可侵犯

的天賦人權，並寫入憲法。

這不妨看作是歷史特定原因塑造而成的文化。一旦成為文化，哪怕再有落後時代之過，也往往很難改變。像西班牙的鬥牛，其血腥殘忍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社會也屢有取締之論。然其生命力依然勃勃。

不過，放眼全球，實行持槍自由的國家並非美國一家。但槍擊案如此突出和頻發卻是美國所獨有。比如加拿大每年死於槍下的人只有一百多人，排除人口比率因素，也遠遠低於美國。顯然，在制度和文化的影響下無法禁槍只是發生悲劇的前提條件之一，同樣重要的還有美國的社會問題。

華府喪失內政治理能力

美國雖然號稱世界上最發達和最富裕的民主國家，但卻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懸殊的貧富差距，二是種族矛盾極為尖銳。

美國貧富差距不僅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甚至高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根據美聯儲的數據，2021年前1%的富豪收入竟然超過全部中產階級。國際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0.4是警戒線，超過極易引發社會不穩定，但美國長期處於警戒線以上。

美國的種族矛盾過去主要體現在對黑人的種族壓迫和歧視。現在穆斯林和拉美裔也日益捲入衝突。種族矛盾已從單一黑人問題上升到多種族。種族矛盾往往演變成相互之間的槍擊悲劇。一再席捲美國的「黑命貴」運動就是2013年一名黑人被槍殺引發的。2016年造成50人死亡的奧蘭多夜店槍擊案則是一名極端伊斯蘭主義者。2019年造成22人死亡的得州超市槍擊案則是白人至上主義者針對拉美裔。

上述因素決定了不管多大的悲劇發生，都無法推動美國進行變革，它已經成為一種充斥各種利益力量的政治制度。各方都把自己的利益置於國家和民族之上，均利用自己擁有的否決能力阻止國家變革。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美國變得無法治理。這才是美國衰落的真正原因。

所以從根本上講，美國真正的威脅不是中國，而是它自己，是面對國內的嚴重問題束手無策。種族問題、槍擊悲劇、落後的基礎設施以及現在的新冠疫情，莫不如此。美國錯把中國的發展當作威脅和原因，本身就是治理能力喪失的一種表現，這樣的國家怎麼可能還有未來？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